

庄永平 著

一个国乐家

半个世纪的亲历

海上散谈录

总顾问 陈圣来
总主编 方立平

中国记忆文库

上海三联书店

庄永平 著

一个国乐家

半个世纪的亲历

海上散谈录

总顾问 陈圣来
总主编 方立平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上散谈录:一个国乐家半个世纪的亲历 / 庄永平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3

(中国·记忆文库 / 方立平主编)

ISBN 978-7-5426-4525-8

I. ①海… II. ①庄… III. ①回忆录 - 中国 - 当代

IV. ① 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10167 号

海上散谈录:一个国乐家半个世纪的亲历

著 者 / 庄永平

中国·记忆文库主编 / 方立平

责任编辑 / 方 舟

特约审读 / 周大成

装帧设计 / 方 舟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校 对 / 莲 子

策划统筹 / 7312·舟父图书传媒工作室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 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网 址 / 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24175971

印 刷 / 上海肖华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87 × 1092 1/16

字 数 / 180 千字

印 张 / 12.5

书 号 / ISBN 978-7-5426-4525-8/K · 244

定 价 / 36.00 元

《中国·记忆文库》编辑出版说明

“记忆”是一种文化再聚合。《中国·记忆文库》是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约请著名文化人、编辑家组织策划的文化工程,旨在将近现代直至当代时空中闪烁奇彩“记忆”的人与事聚合在一起,以产生新的“文化力”和“正能量”。入选“文库”的图书项目应该具有这样的特征:十年八年,或更长的年月后,当我们回首望,依然能见他们如“标杆”在各自领域挺立,如风帆带领着人们向“理想的海平线”奋进。这种文化的再聚合,是历史前行中的价值积淀;是事物发展中趋向性推进的闪亮轨迹;是一种让人永远充满激情的生命的律动;当然,也是一个民族得以生生不息、代代传承的智慧、梦想和财富。

我们热切地期待这项文化工程能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聚合起更多的文化正能量,凸显中国的软实力。

“中国·记忆文库”编选工作室

001	第一章 童年琐忆
001	生命的因缘
006	民族音乐的因缘
019	第二章 上海民族乐团的岁月
020	上海民族乐团学馆生活
031	招待外宾的“伴宴”演出
036	大歌舞——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
038	第三章 借调上海京剧院
038	参加排演京剧《红灯记》、《海港》
040	《海港》的剧本创作
044	《海港》的音乐创作
054	《海港》的排演
066	“文革”之中的上海京剧院
069	第四章 《海港》晋京演出时期的生活
069	毛主席观看《海港》
075	天安门观礼台观看庆祝游行
080	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
085	拍摄《海港》电影
090	观看参考电影

096

北京生活花絮

109 第五章 前《海港》剧组时期杂忆

109 军代表

111 闻捷与戴厚英

113 剧组里的“意外事”

116 于会泳与现代京剧音乐

125 俞丽拿教子

128 第六章 后《海港》剧组时期杂忆

128 剧组选址

133 与海上“闻人”魏绍昌二三事

138 与居士朱幼兰的交往

140 在陕南邨的日子

145 体验苗族生活

152 剧组里的政治生活

155 第七章 恢复上海京剧院

155 中西混合乐队的解体

157 乐队组成了轻音乐队

160 邓丽君歌曲风靡的日子

169 巡回演出花絮

173 第八章 调入上海艺术研究所

173 参加《中国戏曲音乐集成·上海卷》等编写工作

177	开始解读《敦煌乐谱》
180	来自钱仁康等学者的激励
186	组织东方国乐团
188	第九章 尾声
189	后记

第一章 童年琐忆

生命的因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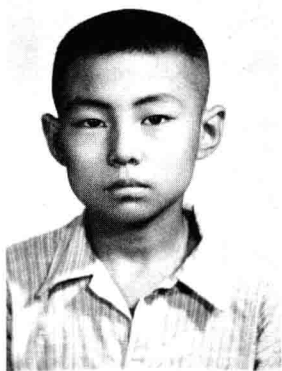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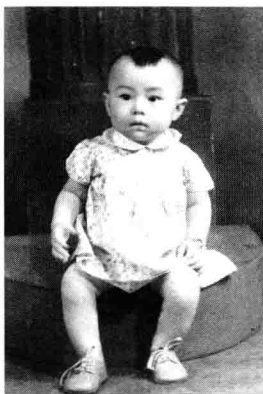
我出生于1945年9月18日,农历是8月13日。“九·一八事变”是1931年9月18日,是日本关东军在我国东北地区挑起的一场军事冲突,也是一起政治事件的日子。这次事件爆发后的几年时间内,东北三省全部被日本关东军占领,因此被中国民众视为“国耻日”。“八·一三”是发生在我家门口上海的一场战争,也就是从1937年8月13日起,中国军队抗击侵华日军进攻上海的战役,被称为“八·一三淞沪战役”。后来我女儿的出生日期是1975年1月28日,“一·二八事变”也是发生在上海,1932年1月28日晚,日本侵略军由租界向闸北一带突然发起进攻,驻守上海的第19路军奋起抵抗,开始了艰难的淞沪抗战历程。真是有点不可思议,我的一生怎么全与日本侵略中国的日子有关?只是后来我工作的兴趣有点涉及日本,那就是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尤其是唐代俗乐与日本雅乐的关系,还有就是译解日本的一些与我国唐代有关的古谱,这当然是后话了。

我的出生日离日本投降的1945年8月15日仅一个月零三天,因此,父母给我起了一个名字叫庄永庆,以示庆祝八年抗战的胜利。

我们几个小孩均属于“永”字辈，大哥庄永嘉；二哥庄永祥；我庄永庆；姐姐庄慧琳。但是，这个繁体的“慶”字笔画太多，小时候总是写不好，这样，后来父母就改用“平”字，同样也是预祝日本投降后天下由此可以太平了。

我父亲庄百铭和母亲葛和笙共生育了我们四个孩子，我是最小的一个，因此很受父母宠爱，母亲叫我是“奶末头”，爱护有加。我家原住在老城厢的福佑路及旧校场路处，也就是今天老城隍庙的核心区域，我出生在老城厢，是个正宗的上海人。但听父亲说起，我的老爹是宁波因太平天国战争而逃难到了上海来。抗战胜利不久，我家搬到了城外法租界的“古拔路”，这是法国殖民当局为了纪念在侵华战争中，被我国

击毙的海军提督古拔将军(Andre Anatole prosper Courbet,)而命名的一条马路，路不长，但在当时属于准高档住宅区。“古拔路”后一度改称“古柏路”，最终改为今天的富民路。我们



童年时的作者

居住的小区(以前称“里弄”)叫“古拔(柏)公寓”，当时是很有名气的“四行储蓄会”(后改称联合银行)的职工宿舍。四行即中南银行、盐业银行、金城银行、大陆银行，是于1923年6月联合组成四行储蓄会了。当时储蓄会的资本总额(“基本储金”)计100万元，由上述四家银行各投资25万元，专门办理储蓄业务，以购买公债和外

汇谋取利润,用来支付存款利息和红利。据母亲说当时他们银行职工中做投机买卖的不少,整天“大头、小头”、“买进、卖出”的,但她胆子小从来不敢做这种买卖的。此外,那时银行的投资方向主要就是房地产,其中最大的一笔投资就是建造于派克路(今黄河路)南京西路口的上海“国际饭店”(Park Hotel)。这幢大楼也是联合银行办公和对外办理储蓄业务的大楼,直到今天此楼还沿用着“国际饭店”的原名。早在上世纪30年代它已有着“远东第一高楼”之誉,而且一直保持着很长的时间。高楼是由当时出生于斯洛伐克建筑世家的邬达克(L.E.Hudec)建筑师所设计,陶馥记营造厂承建,投资500万元建造的,联合银行本身占据了整个铺面一层。据母亲说那时凡空袭拉警报,职工们就躲在大楼的地下室中,这个地下室可谓固若金汤、万无一失的了。后来,国际饭店总部工程师顾问兼四行信托部副经理孙立己一家,就住在我家古柏公寓70号楼下的两层中。另外,“四行储蓄会”的仓库又因1937年10月26日至11月1日的四行仓库保卫战而名噪一时。此仓库与英美租界只相隔一条苏州河,是一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6层大厦。以谢晋元为团长的中国军队“八百壮士”,他们的英勇奋战大大鼓舞了中国军民抗日的士气。

母亲当时仅是该银行的一名小职员(出纳),但她曾就读于上世纪初上海颇有名气的“务本女塾”,写得一手极好的行楷,这是我十分引以为骄傲的。“务本女塾”是由上海人吴馨(1873~1919)于1902年创办的,宣统二年(1910年)吴氏被选为上海县视学兼办学所总董,辛亥革命后被推为县民政长后改称知事,对县建设多有建树。吴认为“女子为国民之母,欲陶冶健全国民,根本须提倡女权”,故“取塾名为务本”。该校是中国第一所女子师范学校,在城

内的黄家阙路上。1937年淞沪抗战中校舍被炸毁,后来在今永康路20号原法国人的学校旧址开学,就是今天的市二中学。“务本女塾”之所以名噪一时,还在于我国近、现代著名“学堂乐歌”的先驱者沈心工先生,沈先生于1904年率先在该校主办“乐歌讲习会”推行唱歌课,这在我国近、现代音乐史上也是一件大事。后来我在上海艺术研究所的同事李梅云的母亲,念的也是这所学校,看来我们共同从事音乐事业,还真有点历史因缘。据母亲说她进联合银行还是靠着点来头的,就是没有经过考试,由表哥曹汝霖一张条子而进入的,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开后门进的。但是,在那时这种情况还不能完全被认为是开后门的。因为进去的人本应该有学历,受过良好教育,并且也是需要相当实力的头面人物作担保的,如果出了什么事情,担保人是有连带责任的。因此,这种所谓的后门是不能随便开的,这也是旧时在人事制度上的一种约束机制。曹汝霖是大名鼎鼎的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曹宅)事件的主角之一,但曹氏在《一生之回忆》一书中认为,当时他并非外交总长,而只是交通总长兼财政总长云云,被首当其冲烧了家宅似乎有点委屈。实际上他早在1904年8月就已任外交部次长,1911年春任清政府外务部副大臣,1913年8月任袁世凯政府外交次长。1915年1月参与同日本公使谈判“二十一条”,1916年4月任交通总长,后署外交总长,并任交通银行总理。不管怎样,曹氏是有名的亲日派是脱不了干系的,故而也就成为众矢之的了。不过,有意思的是素有“亲日派”之称的曹汝霖后来在大义面前并没有沦为汉奸,而当年的北大学生,在火烧赵家楼事件中冲在前面、放了第一把火的梅思平,抗战期间却堕落为一个大汉奸,出任过汪伪政权的组织部长、内政部长、浙江省省长等要职,看来历史常常就会开出种种令人意想不到的玩笑。我

母亲曾讲到她表哥在生活中倒是一个十足的孝子,可能是受到的传统儒家教育较深的缘故吧!有一次他祖母生重病,他还真的按传统要求,从手臂上割下一小片肉放在粥汤里给其祖母喝。曹氏后来在自己的《一生之回忆》一书中,第一章“幼年景象老去未忘怀”有较详细的记载:“十四岁冬天,继祖母病笃,病系外症,在臂上生一血瘤……时时昏厥,医药无效。我想起古时有割股疗亲之事……(遂)用利剪将左臂割肉一片,和粥以进。”后来,母亲一直保存有曹氏的一张大相片压在箱底下,后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抄家发现,造成了很大的麻烦。讲到这里又想到了在那时联合银行以发奖金的形式,给每一位职工发了一张复兴轮船公司的股票。“文革”中家里有股票那还了得,这不成为十足的资本家了吗?其实银行职工都持有这种股票的,能算得上是什么资本家?但在那时确实是会惹祸的。于是,“文革”开始后,父母将股票烧毁后仅留了一个号码,藏在了一个灯头中。“文革”后职员们联合起来大家出资成立追讨小组,母亲被推荐为财务记账员,向美国方面索要几十年的利息,这可是一笔庞大的钱财呀!一开始由于中美财务关系未解冻,后来解冻了可能是美方认为这笔资金数目巨大,便一直以种种理由拖延,故直至今日还未能索回。

在我的童年记忆里,母亲每天的上下班都是有大客车接送的,而一般的经理则有小汽车接送,这种情况在当时也是够显赫的了。另外,像交通银行行长钱新之因担任四行储蓄会副主任及四行联合准备金库主任,也住在我们小区60号的独幢豪宅中。还有曾担任国民政府实业部长的吴鼎昌,因兼任四行储蓄会主任,据说也一度住在我们小区内。我们小区内有个古柏公寓大礼堂(69号),是我国最早留学美国、学习建筑工程学的建筑师庄俊的作品。庄氏曾发

起组织了中国第一个建筑师组织“中国建筑师学会”，多次被推举为会长，1953年，就任上海华东工业建筑设计院总工程师。记得儿时每到逢年过节大礼堂内就热闹非凡，举行各种庆祝晚会及演出等，印象最深的是名家和票友们的京戏演出。后来我在上海京剧院工作，就曾询问过名丑艾世菊等，他们在那时也曾到我们这个大礼堂中演出过。记得有一次不知是哪一出戏中，那个大花脸演员拿着一把刀要杀掉一个人，我看了以后就此吓得发高烧生了一场大病。另外，除了演出外常常还有一些余兴节目助兴，例如，把一个火柴盒中的火柴杆按头尾理齐，谁理得快就有一个小奖品。记得有一次我按要求理齐后发现旁边邻居小朋友，他仅将上面的一层理齐而下面仍然全是乱的，工作人员也给了他一个小奖品。我真有点不服气，向这位工作人员指了出来，说他仅表面一层是理齐的下面全没理齐。想不到那位工作人员竟然说我们就是看面上的，面上齐了也就赢了。这件事一直深深地影响了我的一生。为什么不老实的人反而能得到实惠，老实的人反而吃亏？在此以后的人生中，我凡事总是按诚信的要求办，而依然看着很多人投机取巧却又总是能获得利益，诸如提升职称、加工资、分房子、安排出国演出，等等。可见这种现象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正的。而作为我自己个人诚信与否似乎也是命中注定很难改变的，这可能就是所谓的“性格决定命运”吧！

民族音乐的因缘

父亲非常喜欢评弹和民族乐器，他经常唱唱评弹玩玩乐器，民族乐器中琵琶、小三弦、二胡、箫都能拿得上手。父亲在家里常和我、大哥（有时姐姐也加入）一起演奏江南丝竹《三六》、《欢乐歌》等乐曲，有时也唱唱评弹。我多数是弹琵琶，大哥弹三弦，我父亲是拉二

胡或吹箫,家里时常是乐声绕梁、欢乐无比。现在每当电台里播放由评弹演员演奏的《弹词三六》,就常勾起我童年时的美好回忆,那时的景象历历在目。父亲是天生的乐天派,天天在家里给我们讲历史故事玩音乐,什么气煞金兀术、笑煞牛皋之类的故事,听得我们津津有味,使我们的童年非常开心,充满着欢乐。现在回想起来,他常唱的是朱慧珍唱的俞(秀山)调《宫怨》,蒋月泉唱的《宝玉夜探》等开篇。他时而用小嗓唱,时而用大嗓唱,唱得不亦乐乎。内中特别是徐云志创立的软糯悠长的徐调及当时刚刚创作出来的徐丽仙徐调的代表作《六十年代第一春》等,都是我们非常喜欢听的。父亲还常常带我到当时复兴中路、宝庆路处的“东华书场”去听书,这也给我留下了美好的记忆。父亲说他年轻时就爱玩乐器,曾参加浦东同乡会业余民族乐队,地址就在以前延安中路新城隍庙不远的浦东同乡会本部,辅导老师就是上海派琵琶创始人汪昱庭的大弟子金祖礼。因此,父亲与金氏相识已有几十年了。只是父亲说他主要是做生意,平时很忙,不大有空参加乐队演出,只是常去弹弹大阮而已,故而艺术上也没有什么大起色。但父亲也教出了一个学生夏仁根,



在父亲 90 寿辰宴上全家一起演奏江南丝竹

他是父亲生意合作伙伴人的侄子。上世纪 50 年代初他就到了北京新影乐团民族乐队担任琵琶独奏演员，并曾在 1955 年华沙第五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因一曲《十面埋伏》获得金奖。这是我国琵琶独奏在世界上首次获得殊荣。大概是在上世纪 60 年代初，新影乐团民族乐队首次到上海来演出，父亲曾领着我到夏仁根他们住的茂名南路锦江饭店裙楼驻地会面，当时我已经进入上海民族乐团学馆学习琵琶了。新影乐团民族乐队的这次演出，刘明源既演奏板胡又指挥乐队，演奏他创作的《喜洋洋》等轻音乐曲，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还有一个亲戚是父亲大姐夫的妹妹，她喜称父亲是“五香头”，因为父亲排行老五，说几个弟兄当中就数我父亲聪明能干，什么东西一学就会。父亲教她弹琵琶，她后来也当上了专业评弹演员。她的儿子赖利民后来也从事音乐，进入了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学习琵琶演奏，一度成为我在上海京剧院的乐队同行和同事。到了后来父亲年纪大了，大概是改革开放前后，他又回到了业余民族乐器演奏活动中去，成为江南丝竹活动中最年长的积极分子之一。父亲直至 90 多岁还每个星期四独自到湖南路的文艺活动室中去玩江南丝竹，乐此不疲。我们儿女们也为他在影城旁边的饭店里，举办过庆祝 80、90 岁生日聚会。聚会时也邀请了他的平时经常在一起活动的“江南国乐会”的朋友，大家边吃边合奏江南丝竹，很是其乐融融。我也请了我的一些同事和朋友，来表演《百鸟朝凤》等助兴节目。父亲后来以 94 岁高龄去世。父亲也是像牛皋那样哈哈大笑着离开我们这个世界的，这些都是后话了。

据母亲说父亲人太老实出手又很阔绰，因此做生意老是亏本，人家欠他的钱常讨不回来，自己欠人家的钱又被逼得没有办法。一桩生意亏本以后常又到母亲银行里去透支借钱再做，但屡做屡败。

他什么米行跑街、银行襄理、米行老板等等都做过。到上海解放的时候失业了。后来也是什么工作都做过,很不固定。但是,父亲的手极其灵巧,动手能力很强,什么活儿他都拿得起。什么剪纸、铅丝弯脚踏车、自己做鞋等他都会,最后他就是以白铁匠配玻璃为生的。记得有一次为了节约家庭开支,父亲居然给我做了一顶帽子。这个帽子的活儿可不是好做的,记得那顶帽子做得很像是朝鲜人民军战士的军帽那样,周围是硬边的,中间是软性的,还有一个鸭舌,今天回想时好似一个奶油蛋糕的硬盒子,扣在头上真是好玩极了。

兴许是我父亲的性格较开朗,而我母亲的性格则较为内向;兴许是我和大哥不仅脸像妈性格也像妈,而二哥和姐姐则全像爸,因此,我从小就富于遐想,心灵比较脆弱,且常带有伤感的情绪。看到凄惨的场面或听到伤感的音乐,常常不免流泪而伤心不已。有时候我会对着天空自言自语:“星星为什么会这么亮?月亮为什么有时还会缺掉一块呢?”现在回想起来,那时收音机里常播放赵元任的歌曲《叫我如何不想她》,开始两句:“天上飘着些微云,地上飘着些微风”,那种音乐的氛围与意境就很适合我的那种富于遐想的感觉。后来又非常爱听李叔同填词的歌曲《送别》,那伤感的唱词和平静的音调,几乎百听不厌。而且偏好中国古典诗词,又明显偏向于“词”。这不仅因为是词的句型长短不一,平仄交叉不齐,更主要的是词常带有伤感的成分,有“无可奈何花落去,天上人间”之感。童年时我们几个小孩还经常会伏在窗前等妈妈回来,常会因没有看见妈妈进弄堂,她便已进门叫我们而感到奇怪(其实我们是看着妈妈出去的方向等她回来的,而妈妈下班后有时则从南京路兜到淮海路买东西,然后便就可能从另一个方向回来了)。童年种种天真的求知欲和幼稚的遐想,现在回想起来很可能就是为我后来走上音乐理论研究的道路、尤其喜欢研究翻译古谱等

“牛角尖”问题，从小埋下了根子。

我们小区有个银行面向自己职工办的小学，就是古柏路小学，后改名为富民路小学，这种内部小学在当时是较为少见的。而在校就读的学生大部分都是联合银行职工的小孩，因此，哥哥、姐姐为同班同学，弟弟、妹妹也为同班同学。我有一个同学叫顾大伟，就是后来有点名气的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第二代“阿福根”顾超，也不知道他是从什么时候起改用顾超名字的。他的爸爸也是联合银行职员，哥哥顾大龙和我大哥庄永嘉是同班同学，我和他是同班同学，本来他们一家住在72号，我们一家住在70号，靠得很近，经常在一起玩。后来他们搬家了，失去了联系。记得后来唯一见到他的一次，是我到北京东路2号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录制音乐节目时与他偶遇，才知道他就是“阿福根”。那次，我们回忆起作为同学时的小学生活，他是个有名的“顽皮大王”，学习成绩也不是很好，却想不到后来竟会在“讲上海话”方面有所作为。一直听老人说小时候顽皮的孩子大了常常会有出息，看来此话不假。记得有一次他在课堂上实在顽皮得出了格，语文老师陈炳文要拉他出去，但他人较胖，又像是没有骨头架子似的，紧紧粘住课桌椅不放。陈老师一会儿抓住了他，一会儿又被他滑掉，后来干脆将他连人带课桌椅一起甩出了教室。而陈老师手上戴的名表也给砸坏了，气得他直喘大气说不出话来。还有一次“阿福根”把扫帚和簸箕放在教室的门上面，门微开着，老师一推门进来，扫帚和簸箕一股脑儿就砸在头上，引得学生哄堂大笑，可大家都不吱声也不敢说是谁干的，老师虽然十分生气，但也没有办法。这种出格的事情现在大概不太会发生，回想起来内心竟会觉得还是蛮有趣的。但后来听到了顾超在1997年2月录完“阿福根”节目后，骑着助动车沿外滩中山东一路急驶回家，由于路上灯光较